

经济变革的文化叙述

古德曼

There are essentially three difficulties attending any search for 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change in China: culture can be a broad and often a somewhat imprecise concept; the scale of China makes for difficulties in the unit of analysis; and the assumption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may be somewhat attenuated. The antidote to essentialisation about Chinese culture is to approach explanation at a more local level. A recognition that there are local accoun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that both help motivate behaviour and provide legitimation for specific forms of activity provides a more convincing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both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evidence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own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and their entrepreneurs in Taiyuan, provincial capital of Shanxi; of Islamic Salar entrepreneurs in Xunhua (Qinghai Province); and of women entrepreneurs in Qionghshan, Hainan, suggests that at the local level 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terests have harnessed symbolic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ms of culture for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goals, including attempts to create a loc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particular industries and social groups. In this process local cultural practice is used to underpin the manne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structures of ownership,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s well as to some extent the kinds of economic activity that are developed.

在海外，除了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种种讨论之外，人们通常不喜欢用文化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变化。海外学人主要从商业范畴，尤其是商务管理的角度研讨中国经济变革的原因。从事对华贸易咨询工作的人士无一例外地提到中国文化的微妙之处，尤其是商务活动对“关系”的依赖性。

事实上，以过去三十年来以中国变化为背景所进行的所谓文化研究，多以“关系”

为焦点，甚至完全排除其它的文化要素。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关系”这一具有特殊内涵的词语首次出现在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它最初涉及的是政治领域。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构建要素，无“关系”则无贸易活动的成功。然而，以“关系”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焦点无疑值得商榷，问题不仅在于它把中国社会及文化过度笼统化了，而且在探讨文化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尤其是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妨碍了人们进行深入的、富有积极意义的思考。

本文无意对白鲁恂早年形成的“关系论”，以及“关系论”在后来的文献中的演化与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评判。既然有一套完整的语汇来描述此类做法，当然不妨说它构成了文化的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尽管如此，把“关系”及与其相关的做法看成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会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形成广泛的负面影响。许多国家或文化都有特定的语汇来描述类似的行为，以色列有“protectsia”，意大利有“influenza”，更不用说英国的“Masonic”了。绝大多数国家或文化，在社会制度与规则未定之时，或当其法律体系尚不完备或遭受破坏之际，或者在新政体草创之初，都会出现类似的做法，并以此来协调社会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篇探讨所谓新生代企业家的诞生的文章中，查尔斯·蒂力曾使用这样的语言：“欢迎来到17世纪！”¹

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所发生的巨变，必定会遇到三方面的困难。其一，文化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其二，中国幅员辽阔，难以确定分析单位；其三，历史连续性可能被淡化或弱化。任何关于“文化”的定义几乎都必定要遭受质疑。在实践层面上，文化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称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它不仅包括一个社会特征的所有客观表象或表现形式，而且包含了该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其它构成部分，甚至可以包含该社会本体的全部；它也可以指某一特定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个层面的标志性特征。在前现代中国，文化不仅指高层次的教育，而且还包括运用汉语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被看成是文明社会的一员，而没有文化、未受过教育的人群则被看成是“蛮人”。这种涵盖一切的“文化”定义，对于学术研究裨益甚少。假如如此宽泛地探讨“文化”，假如将万事万物都看成是“文化”，那么实际上任何一个事物又都不是“文化”，因为“文化”在此失去了可把握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文化”必定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常成被看成是一种明确而有形的资源，或（通过一些黑匣子理论的解释）被看成是一种能把社会历史背景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神丹妙药。毫无疑问，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文

¹ Charles Tilly 'Welcome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Paul DiMaggio (ed) *The Twenty-First-Century Firm: Chang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00.

化既不是团体或个人的有机特性，也不是其基因特性。文化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偶尔（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例如新政权的诞生之初）被准则化，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代表着社会的共识，并不断被调整，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实际上，了解究竟是何人为了何目的在企图掌控（和准则化）文化，与确定文化的任何特殊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研究中国的问题，不能不把幅员辽阔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生活在欧洲大陆以外的某一个岛国上的六千万人口，甚至掌控着欧洲经济的八千万讲德语的民族，均不能与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巨大陆地上的十三亿人口相比拟，更不可相提并论。中国是一个大陆体系，它包容了无数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与习俗。按照世界范围的标准，中国的34个省级管辖单位，几乎每一个都具有一个国家的规模。² 即使在同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方言及有关生育、婚配与死亡的社会习俗均存在巨大的差异，烹饪手法与技艺则更是各不相同。仅广东一省就有六种主要方言，中国北部的山西省有五种。在山西省的上百个县中，几乎每一个县都有鲜明而各不相同的方言变体。虽然经济发展使社会文化呈现趋同倾向，但和经济一样，社会文化的融合尚处于较低层次。³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的存在，而是说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重大实际意义。关于国家政治及治国之道，在全中国范围内一直存在着普遍认同的共识，这些共识也早已展延到国家与国民的教育体系与文化，尤其是写作与绘画艺术。但另一方面，其它社会活动，特别是家庭结构、音乐、物质文化、饮食及商务行为惯例与准则等，都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这一切既是历史沿袭的产物，也有外部影响力的作用。

许多关于现代中国国民性的研究都把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古代中国等同起来，把现代中国看成是封建帝王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⁴ 这些讨论常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中国的儒教传统，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其作为中国国民性的代名词。此外，虽然这些研究也考察分析汉族中国人和中国的其它民族之间的种族文化差异，但无一例外都承认这些民族是中国人，在历史上也一直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然而，这些有关中国国民性的大相径庭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看法，均属于现代的观念，起源于欧洲人关于君权和个人尊严与身份的理念，与中国古

² David S G Goodman 'China in reform: the view from the provinces' in David S G Goodman (ed)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1997, p.1-15.

³ C W Kenneth Keng 'China's future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0, November 2001, p.587; C W Kenneth Keng 'China's U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5 February 2006, p.183; David S G Goodman 'Structuring local identity: nation, province and county'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2, December 2002, p.837.

⁴ John Fitzgerald "'Reports of my death have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the history of the death of China'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China Deconstructs* Routledge, London 1994, p.21.

代封建帝王政体和儒教传统水火不容。⁵ 此外，所有这些观念的历史均不足 100 年。公元 1900 年以前的中国人用当时的朝代名号来称谓自己的国家，把他们自己称为该朝代皇帝的臣民，而不是称之为“中国 (Middle Kingdom)。”“汉人”一词是 20 世纪才出现并被采用的民族称谓，它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是因为中国古代汉朝（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1 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要纠正将中国文化过度笼统化的问题，就需要从区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具有区域性的原因，这些原因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为各种社会活动提供合理性，这样的观点为深入理解文化在经济环境的演变和商业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框架。有学者指出，重视区域文化和区域特性，可以鼓励当地人参与商业活动；突出宣传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例，可以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供保障。⁶

本文作者曾对山西省会城市太原的乡镇企业及乡镇企业家、青海省循化县的穆斯林撒拉族企业家和海南琼山市的女创业史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区域经济层面，国家及经济利益体都曾为了一些特定的经济利益与目标，如特定行业和社会团体营造区域竞争优势，而支配与利用文化的一些象征意义与表现形式。在此过程中，区域性文化习俗成为商业的发展模式的一个基础，其中包括所有制结构、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商业活动。每一个社会群体均由此而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变革史，并以此来解释每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及他们所属的群体在世界上的位置。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司和企业不应该隶属于任何特殊的关系网络，因为关系网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强调的是，个性化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深层次的，长期渐进性的，而且毫无疑问是区域性的。

太原的乡镇企业家

山西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在煤炭、焦炭、铝资源和特种钢行业占据这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有着源远流长的社会基础。这种源远流长的社会根基起源于 1937-1945 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进行的全民动员，在当时，全国有三个抗战前线位于山西境内。在 1938-1945 年期间，邓小平曾长期驻扎在山西的西南部。自 20 世纪

⁵ Frank Dikotter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C Hurst and Co, London, 1997; Shih Chih-yu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Routledge, London, 2002; Yingjie Guo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Routledge, London, 2003.

⁶ David S G Goodman 'Local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History,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as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Barbara Krug (ed) *China's Rational Entrepreneu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rivate business sector* Routledge, London, 2004, p.139.

70年代末以来，许多与邓小平一起设计并领导中国改革的人也来自山西，而太原市则是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聚集并放大的中心地带。

由于其内陆的地理位置，山西在紧跟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末开始实施的全国性改革开放政策方面却显得动作迟缓。然而，1992年以来，山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经济改革，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1995年以来，山西每年的GDP增长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该省所制定了“赶超”政策，目的不仅是要实现经济的增长，而且要重组当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模式，其核心是要发展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要发展成为全国其他地区主要的能源供应省。

实施这一新政策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弘扬地方文化，强调山西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和山西地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通过大量的文化宣传工作，彰显山西在中国文化与传统中占有的核心地位（及发源地地位），以及山西在中国共产党经过抗日战争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山西地域文化的本体性和自给自足性也得到无以复加的重视。发展地方文化的政策为突飞猛进的经济结构变革提供了法律依据，接受我们访谈的太原乡镇企业家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行动，无一不充分印证了这一点。⁷

从山西的资源条件来看，作为地方经济发展重心的重工业的业绩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尤其是以煤炭产业及其副产品（包括化工和塑料）为核心的产业。而在一向趋于保守的政治体制中所发生的变化却更让人感到惊奇。自1949年以前开始，太原就是党政掌控的城市，现在仍然如此。有人认为，浙江和江苏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它们有时游弋于党政的直接控制之外，⁸而山西与浙江和江苏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在太原，企业必须高度参与政治。企业家一般在创业之初就拥有坚实的党政基础，如果他们当初是“局外人”，在“赶超政策”的激励下，他们一定要做好在地方党政工作中发挥作用（常常是领导作用）的心理准备。

到1998年，太原市共有企业51813家，其中服务性企业21810家，国有企业5306家。一些支持改革的地方权力精英，以其在重工业企业和党内的根基，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中的佼佼者。同时，那些先前不具有政治优势的企业家，特别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家，也有了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遇。然而，这两类企业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系列的战略性联姻，包括资本和知识之间的联姻、地方权力精英与先前的圈外人间的联姻，以及民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之间的联姻，均成为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推动力。

⁷ 受访者共143人，其中乡镇企业家33人；民营企业35人；合资企业经理10人；民营企业经理23人；业主兼经理42人。

⁸ David S G Goodman 'Regional interactions and Chinese culture: openness, value change and homogenisation' in James Goodman (ed) *Region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acific Rim* 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 Press, 2006.

从形式上看，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则不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其所有权属于公司里的职工或地方（主要是在农村地区）；民营经济由所有者经营。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用这些差异来解释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已经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⁹ 随着经济变革的深化，乡镇企业家可以根据企业组建时的情况、资金的主要来源、以及企业活动的规模分为五类：农村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合资企业的管理者，私营企业管理者、和业主兼经营者。

“农村企业”包括由太原农村和郊区的乡镇、村、和区出资建立的集体企业和股份公司。尽管这些企业起初规模都很小，以村组为生产基地，通常由原先的农具厂、商店和饭店转化而来，但它们利用了国家对农业经济的优惠政策，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公司，尤其是矿业和与之相关的产业。

从技术层面来看，任何吸纳了来自中国境外，包括香港，投资的企业都可以列为“合资企业”。在太原有大约一百家这样的企业，这其中有半数的投资来自台湾和香港。尽管这些企业大多为规模较大，且发展势头良好的民营企业 and 国有企业，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乡镇企业和社会团体所属企业转化而来的。这些企业家都具有很好的政治背景，其父母曾担任高层党政领导职务，有些自己本人就是党政领导，受过较高的教育，通常都是中共党员。

“民营企业”这个名称适用于通过和地方政府合作而成为集体或股份制企业，但原先的领导人依然居于高级管理岗位的原国有企业。“业主兼经营者”指那些拥有并经营整个民营经济企业的企业家，或者通过承包方式经营由乡镇、当地政府、国家、集体出资筹集的企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业主兼经营者通常具有年轻，未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被排斥在政治和经济圈子以外的特征。¹⁰ 20世纪80年代，太原的业主兼经营者也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的业主兼经营者虽然大多年纪较轻，但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吸引了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父母大多属于社会上层，如国家官员和党内成员，而不是处于政治经济边缘地带的人群。

最后一类新型企业家是较大型的民营企业的经理人。有些特大型民私营企业在规模上和大型国有企业不相上下。和合资企业的经理人一样，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经历，并且都是中国共产党成员。

综上所述，共产党在太原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然而，为了顺

⁹ Victor Nee 'Organis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i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7 no.1, 1992, p.237; and David S G Goodman 'Collectives and Connectives, Capitalism and Corporatism: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a' in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1 no.1, March 1995.

¹⁰ For example: Lynn T.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Vol.1: Local Cause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M.E.Sharpe, New York, 1998, especially, p.127; and Susan Young 'Wealth but not Security: Attitudes Towards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in the 1980s'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5, 1991.

应国家新的首要任务，共产党为了确保其核心地位所采取的步骤和弹性策略完全是调整适应性的，并不是由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而驱动的。共产党在新建企业中的作用也许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九十年代，异乎寻常多的党政机关官员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子女转变为乡镇企业家。他们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都建立在父母与党政机关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因而一些小型企业的业主兼经营者甚至看不到自己有必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太原的乡镇企业家走过的职业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作为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在发展经济和领导企业方面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二是在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业主兼经营者型的企业家中非党员人数占有较大的比例，尽管绝对数量有限，却反映出这样一个企业家与党的融合过程。业主兼经营者型的企业家大多年轻，他们的企业规模也不大，随着他们取得成功，他们将成为民营企业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如果他们尚不是共产党员，就极有可能被邀请加入，尤其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党员。一些较有名望的成功企业家（通常掌管着大型的企业），虽然其公司内部成立了党的组织，自己却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可以作为模范企业家得到广泛的宣传，成为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无疑参与党政领导工作的又一种形式。

循化县的撒拉族企业家

总体而言，与山西相比，中国西北部青海省的各少数民族社群适应新一轮经济改革精神的步伐更为缓慢。¹¹ 青海东部循化县的撒拉族人却是个例外。尽管按中国东部的经济发展标准来衡量，这里的大兴创业之风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大的财富，但作为青海省的一个县来说，却非常可观。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持续增长，该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到 2001 年已达 3000 万元人民币（合 375 万美元）。这一显著的巨大变化似乎是撒拉族文化复兴的产物。考虑到从 1958 年到约 1982 年期间，中国对撒拉族文化一直采取压制性政策，这样的成绩就显得越发值得称道。

2001 年循化县大约有 12 万人口，近 3 万户居民，147 个村镇。虽然该县有一部分人口（占 24%）为藏族，聚居在东部的藏族村庄，从事农业耕作，主要人口还是撒拉族人（占 62%）。撒拉族人作为来自撒马尔罕（或来自于其它任何地方）的流落民族的历史遗存已经逐渐消亡，¹²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历史遗存在解释撒拉族起源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把“流落”看成撒拉族民族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撒拉族不像其他流落民族那样有着回归原籍的强

¹¹ David S G Goodman 'Qingha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st: Nationalities, communal interac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8, June 2004, p.379.

¹² David. S. G. Goodman 'Exiled by Definition: The Salar in Northwest China' in *Asian Studies Review* December 2005, Vol.29 No.4, p.325.

烈愿望，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受迫害的民族。相反，在我们对撒拉族商人和地方领袖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流落和迁徙现在又已经被看成是撒拉族人追求与创造财富的手段。该县的主要经济活动历来就是向外县输出劳力，羊毛加工业，织布业以及带有浓厚伊斯兰教色彩的制衣业等。

宗教、语言和循化近年来一直被看成是界定撒拉族民族身份的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增进了当地人民的集体感情，加强了团结，并激励他们参与经济活动。撒拉族人的流落历史也使他们相信他们具有竞争优势，因为他们虽然生于此，长于此，但并不是本地区的原始居民。他们自认为比周围的人更具流动性，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具活力的主力军。

从与当地企业家的访谈中，我们可以了解撒拉族人的地区特殊性，尤其是这个民族早期的流落史与他们现在活跃的经济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些企业家不仅展示了撒拉族人在发展循化经济方面的积极态度，而且展示了他们在开发青海乃至中国西北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参与精神。这些访谈充分表现了撒拉族人的主观能动性，展示了撒拉族地方领袖与商人的开创精神与领导能力。受访者都特别谈到了撒拉族作为“外来者”特殊身份如何驱使他们去拼搏、去奋斗，强调了撒拉族人生理上所具有的流动性及向外拓展的人生观；他们还开发了当地产品，包括开发带有宗教色彩的艺术品并以此来开发更为广阔的市场。

“我年青的时候就成为企业家了，”一位姓马的总经理坦承道。¹³ 他的企业集团目前拥有一家运输公司，有 12 辆卡车穿梭于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之间；还有三家宾馆，分别位于循化、西宁和平安（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就在西宁的东部）。年轻时他就在青海、西藏、甘肃和宁夏等地经商，销售服装和食品。后来，他把自己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商赚来的钱投资到了宾馆业和汽车运输业上。当我们问到他的成功秘诀时，他的答案是：撒拉族人的宽阔胸怀与充沛的精力。“正如我们的流落历史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他说道，“撒拉族人历经磨难，但依然兴旺不衰”。其他受访者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创立并发展了青海省最大规模公司之一的韩姓总经理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公司生产加工羊毛和牦牛毛。他把公司的成功直接归功于撒拉族人是“外来者”，因而总是愿意比别人更努力，更愿意吸收新技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韩总经理曾经是循化一家从事羊毛加工的国营企业的经理。到了 90 年代，他改组了公司，扩大其规模，使之成为当地的集体企业。该公司最初从事羊毛加工，他认为青海循化的羊和羊毛质地是最好的。后来他又把业务扩展到了牦牛毛的加工。为了寻

¹³ 2002 年 8 月 6 日在鸡西镇（音译）进行的访谈。马与韩是撒拉族最常见的姓，“马”常被看成等同于穆罕默德，“马”与“穆”同音。除受访者身份明确，或受访者明确表示不需要匿名的情况外，所有受访者的名字都进行了改变，以达到匿名的效果。

找新设备，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最终从意大利购得。公司随之取得了巨大成功，到 2000 年他便将公司总部搬到了西宁。该公司的产品不仅出口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而且也出口北美。和许多新兴的撒拉族实业家一样，韩总经理特有的民族情结使他不仅尽力为本族人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成为当地社会事业的主要赞助者。

琼山的女企业家们

利用当地文化来支撑经济变革与商业发展的第三个例子是海南琼山的一些女企业家的创业经历。海南省是一个社会等级鲜明的地方，共有五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各个阶层的人对这个海岛的特征定位和自治性都具有各不相同的见解。这儿的人们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尤其是 1949 年以后的经历），种族身份、语言差异、海南的经济地理和在海南在全国政治经济中的明确定位，造就了一种自我归属感与自主意识都很强烈的社会意识。在海南的 700 万总人口中，有约 200 万是操海南方言的当地人，他们是 1949 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源源不断从中国大陆移居到海南的移民的后代；黎族人口约有着 100 万，他们是海南岛上的原土著民族；还有数量不多的壮族人和苗族人；此外还有来自与海南岛北部毗邻的大陆地区的操广东方言的人，他们世代代居住在岛上已有好几个世纪了。

岛上的大部分人口隶属于三个 1949 年以后移居于此的规模大致相当的社会群体。第一个群体被称为“老一辈的大陆人”，他们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来到这里，当时的任务是确保大陆对海南岛的政治控制；第二个群体是原海外华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因为在东南亚地区处境艰难而回到这里，并在此找到了安居乐业的场所；第三个群体是“新一代的大陆人”，他们或他们的家庭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来到海南。来自大陆的两个社会群体掌控了海南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更多的海南本地人被排斥在高级领导职务之外，其一方面原因是他们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不标准，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实施了旨在“防止地方主义势力”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禁止来自同一地区高级干部在同一个领导部门任职。¹⁴

来自大陆的两个社会群体几乎都住在海南的省会城市海口。海口市于 2002 年合并了相邻的琼山成为现在的大海口，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历史上，琼山的地位比海口重要得多，从唐朝开始，琼山就是海南岛上的主要城市，而海口只是个港口。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种关系也没有改变。由于这样的历史地位，琼山人对他们的身份有着极大的自豪感。在接受我们采访

¹⁴ Feng Chongyi and David S G Goodman 'Hainan: communal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 in David S G Goodman (ed)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1997, p.53.

的人中，有约 40%左右的人将琼山的“光荣历史”看作是经济上的优势，特别是他们坚定地相信琼山的历史遗迹更能吸引游客。3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琼山自并入到省会以来，经济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大约 2/3 的人则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大海口的发展对琼山的发展是不利的。

移居是了解当代琼山发展的关键，而且已经成为琼山地域特征的代名词。正如前文所述，尽管琼山尚有一部分海南本地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琼山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新一代”或“老一代”的大陆人。由于在过去的十年中（截止到 2004 年在本文作者在海南进行的实地调查）海南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迟缓，因而从其它城镇和地区迁移到琼山和海口寻找工作的“老一代大陆人”在琼山人口中也占了很大的比例。

在受访的海南女企业家中，有三分之二是 1988 年以后移民到了海南的，其余的是老一代的大陆人。而这些老一代大陆人里约有一半原先就已在琼山安居落户的家庭，还有一半原在其它地方落户，最近才迁移到琼山。受访的女企业家中有 6 位未婚，而在已婚的女企业家中，她们的丈夫基本都有相同的移民背景，其中只有三人嫁给了海南本地人。虽然受调查的很多人来自湖北省和江西省，但从这些女企业家和她们丈夫的来源省份的分布情况来看，不难看出琼山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由同乡或同村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在决定是否移民和如何发展自己的事业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接受访谈的三位女子和她们的丈夫都来自江西，而且是同乡，在琼山的同一条街上经营服装店。采访中，这些女子告诉我们，在她们江西农村老家，大部分人都从事制衣业，到琼山创业在她们家乡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接受访谈的属于“新一代的大陆人”的女企业家们移居海南后一般都从事服务业，包括美容、艺术及艺术设计、制衣、服装经营、推销保险、餐饮、眼镜，还有在海南必不可少的房地产。受访女企业家的企业规模总体来说都不大，尽管如此，正如一些城市规划者在 1988 年所预测的那样，服务业现已成为海南经济中产值最高的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8%）。

为了了解调查琼山地域文化的发展，我们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性别上，尽管我们的原始材料来源于我们对女企业家的调查。然而，有趣的是，在海南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女性，其中包括因为在革命斗争中的出色表现于 1949 年后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她们后来更是因江青策划的同名现代革命芭蕾舞剧而风靡全国；此外还有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蔼龄及宋美龄。根据作家、学者余秋雨的观点，正是这些具有杰出才干的女性赋予了海南岛注重“柔和、平静而又自然美”的母性文明。¹⁵

¹⁵ Feng Chongyi, 'Seeking Lost Codes in the Wilderness: The Search for a Hainanese Culture', *The*

在海南有非常多的妇女加入到劳动大军里来，这常令来海南的外地人感到惊讶。在中国其它地方通常被认作只有男性才做的工作，例如杀猪卖肉或蹬三轮车等，在这里却往往是由妇女来做。当地人对此的解释是过去男子靠捕鱼养家，当他们出海时，妻子就不得不承担所有劳动，同时还要照顾家庭。这一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现在即使男子不再出海打鱼了，他们的妻子仍然固守职责，承担起里里外外所有的工作。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海南男子对生活所采取了放松、随便的态度。“老爸茶馆”的传统就是海南所独有的。这里的男子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坐上一整天在一起闲聊。这种传统习惯曾经使的一位海南省的人大代表于 2005 年提出议案，要求海南的男性“善待女性并且在生产和家庭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变革的叙述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了地方文化与经济变革及企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这些案例没有普遍的代表性，但也许可以说明解构“中国文化”的必要性。不过，像本文这样以地方社会经济变革来定义文化并非十全十美。有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的确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但文化的其它一些影响不仅来自经济行为（社会等级和企业商务活动），甚至来自儒教传统和政府行为或者雅文化习俗。从长远的观点看，其它的文化影响，尽管不代表前进的目标，也应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被纳入地方文化的范畴，取决于叙述社会经济变革的人、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他们的用意何在。不仅如此，虽然变革叙述的变化时而缓慢，变革的地方化叙述因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此过程中，地方文化不仅反映出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于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而且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解构中国是一项有趣的活动，此外，以地方文化作为研究的重心，对于理解国家与社会变革的动力来说可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参考书目

- Dikotter, Frank. 1997,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C Hurst and Co, London; Shih, Chih-yu. 2002,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Routledge, London; Guo, Yingjie. 2003,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Routledge, London.
- Feng, Chongyi and Goodman, David S G. 1997, 'Hainan: communal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 in David S G Goodman (ed)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China Quarterly, 1999, No. 160, p 1044.

- Feng, Chongyi, 1999, 'Seeking Lost Codes in the Wilderness: The Search for a Hainanese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0.
- Fitzgerald, John. 1994, "'Reports of my death have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the history of the death of China' in Goodman, David S G and Segal, Gerald. *China Deconstructs* Routledge London.
- Goodman, David, S. G. 1997, 'China in reform: the view from the provinces' in Goodman, David, S. G. (ed)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 Goodman, David S G. 2004, 'Local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History,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as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Barbara Krug (ed) *China's Rational Entrepreneu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rivate business sector* Routledge, London.
- Goodman, David S G. 2004, 'Qingha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st: Nationalities, communal interac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8, June.
- Goodman, David S G. 2006, 'Regional interactions and Chinese culture: openness, value change and homogenisation' in James Goodman (ed) *Region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acific Rim* 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 Press.
- Goodman, David. S. G. 2005, 'Exiled by Definition: The Salar in Northwest China' in *Asian Studies Review* December, Vol.29 No.4.
- Nee, Victor. 1992, 'Organis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i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7 no.1; and Goodman, David S G. 1995, 'Collectives and Connectives, Capitalism and Corporatism: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a' in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1 no.1, March.
- Tilly, Charles. 2001, 'Welcome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Paul DiMaggio (ed) *The Twenty-First-Century Firm: Chang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Susan. 1991, 'Wealth but not Security: Attitudes Towards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in the 1980s'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本文作者古德曼，悉尼科技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地方社会政治变革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三十余部专著和大量的文章。近著包括《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英国伦敦 *Routledge* 出版社 2002 年版）和《革命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抗战期间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1937-1945》（美国 *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 2000 年版）。目前古德曼教授主持进行的大型研究项目有两个：一是中国妇女在家庭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二是青岛在德国殖民时期（1897-1914）的社会发展。